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二十九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 7-218-02403-3



9 787218 024035 >

ISBN 7-218-02403-3/K·550

定价：9.80 元

15.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二十九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卢 荻

责任技编：黎碧霞

广东党史资料（第二十九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厂址：广州市西溯路51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78,000字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218-02403-3/K·550

定价：9.8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回 忆 录

六十年的战斗历程（下）	杨应彬（1）
关于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若干问题的回忆	李沛群（72）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广雅	黄文康（107）
——忆“中国青年同盟”的一段光辉历程	
从罗浮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到粤北根据地的开辟 ——缅怀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	张江明 黄 业（115）
强梁海盗雄兵扫	何 通（127）
忆李建安同志	徐 明（144）

党史专题

三十年代广州的左翼文化运动	杨 建（149）
华南抗日根据地	官丽珍（160）
方方与中共中央上海局	高宏的（187）
中国共产党与战后香港进步文化阵地（下）	袁小伦（200）
惠州解放前后纪事	郑志强（228）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充分调动各阶层

人员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述略

..... 张东虹 彭建新 (237)

建国初期广东查禁烟毒的斗争 叶文益 (254)

湛江港城的建设及对粤西经济发展的影响

..... 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274)

英德反地方主义的始末 温福京 陈丽芳 (286)

惠阳县的抗美援朝运动 邹金城 (301)

党史人物

林伯渠在广州的革命活动 李 坚 (310)

谭平山传略 巫 忠 陈登贵 (326)

问题考证

关于“高要惨案”一些问题的考辨 梁汝森 (373)

六十年的战斗历程

杨应彬

六、十年浩劫期间

(一) 进入“文革”之前

在“四清”期间，“文革”尚未正式开始之前，全省进入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大家都到博罗的黄山洞去取经，说他们那里活学活用的经验好。有人认为他们毛著学得好，但生产并不好，这些话公开不敢说，只是在私下议论。广州市则推广岑村大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四清”工作队分期分批前去学习。1966年5月间我路过惠阳，在招待所里刚起床就听到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说要把17年的文艺黑线和30年代的文艺黑线联系起来，感到很突然。回到广州看到中央一个文件，就是林彪委托江青召开解放军文艺座谈会的纪要。看后才知道早晨广播的来龙去脉。关于17年来文艺如何估价问题是一直有争论的。至于要和30年代的文艺联系起来还是第一次听到。我想这里面一定包含着我们并不了解的政治内容和背景。

接着我去湛江参加写广东农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文章，是红旗杂志的约稿。从湛江回来的路上，听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的广播，又有《人民日报》的社论，感觉到形势要变了。后来听到林

彪谈政变的传达，看到“五·一六”的通知，越来越感到不可理解。不久，看到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明显地感到矛头是针对刘少奇的。10月下旬我还到北京去旁听中央工作会议的后半节，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他说：“我不是想打倒你们的。你们就是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听完这些话感到问题又好象并不十分严重。但大家都尽量往深处去理解。从北京回来后，总感到乱哄哄的。生产要继续抓，全国红卫兵串连，串到广东来的不少，要热情接待。省里派出的工作队要不要撤出来？对“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理解？怎样抓才算认真，才算得力？心中完全无数。

(二) “夺权”之后

1967年1月，上海市委被王洪文等一伙人夺了权，叫做“一月风暴”。广东的造反派也很快进行夺权。交了印，就算交了权了。在茫无头绪的情况下过了一段时间。这时军队出来支左了。军队派人到省委支援春耕生产。陈德为主任，军队的同志要我出来任办公室副主任，因为我对农业生产和地方情况还比较熟悉。在这种乱哄哄的情况下，我尽一切力量协助部队把生产抓起来。有一天，突然在大院里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大特务左洪涛”，我看了心里吃了一惊。左洪涛是特支的负责人，揪他，整个特支就难免了。当时我还在生产办公室工作，造反派不敢马上来揪我。大约6月初，我正在军区第一招待所整理材料，被造反派骗出去看大字报，走到东山路口遇到黎亚刚从党校回来了，我们一起在百货大楼对面看大字报。黎亚说肚子很饿，她就到小店里去吃馄饨，说吃完了再和我一起看。谁知黎亚刚回来时，我就被造反派包围住了，他们要把我揪走。我说我在军队

支左的生产办公室工作，你们要揪我，可以通过组织。他们蛮不讲理，几个人把我推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上，黎亚看着我被拉走，也无可奈何。在那个年代是没有理可讲的，也没有法可循的。

我被关在中山大学地下室，由两个学生看守，陪我睡，有时还可以出去看看大字报。以后把我转到沙河顶的音乐专科学校，就在市委党校的对面，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能碰到黎亚，但是杳无踪影。以后又转移到新河浦李超同志住的地方。主要是要我交待特支的材料。这个时候，我隐约听出造反派来抄家同小孩冲突的情况。他们还问我认不认识叫“高桥”的，说在我家院子里的枯井中捞到了子弹。我说不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认识叫“高桥”的人。但我知道日军占领广州期间我那间房子住过日本军官。造反派对我逼了一个多月，没结果，最后把我交给警备司令部。有一个夜晚，警司的人把我送到郊区太和镇旁一个部队的营房里。这时看到很多熟人被抓了进来。有区梦觉、吴有恒、李一清、刘田夫、王德、李嘉人、雍文涛、王阑西、余慧等。看到这么多人都是“走资派”被关起来，心里反而安定下来了。后来又把我转到梅花园，熟人就更多了，约有200多人，里面有周钢鸣、左洪涛、谭度、柯麟、王全国、王匡、王阑西、王金鼎等人。有一次上厕所，钢鸣同志看到周围没有人，轻声地告诉我，“我关在防空委员会时见到黎亚。”我问他：“她身体好吗？”他说：“很好。”在这种情况下能讲上两句话，通个消息就很不简单了。他是冒着风险把黎亚的消息告诉我的，同志深情，胜似家书万金。后来钢鸣逝世时，我写诗悼词，其中一首是讲到这段情景的：

长相忆，
最忆梅花园，
铁疾藜前花烂漫，
迷茫雾里志弥坚，
心照两不宣。

在梅花园时，经常有人被拉出去批斗，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林挺同志。我原来以为他解放了，先出去了。谁知不久又回来了，他偷偷地告诉我是去挨斗。讲到批斗会上，他的妻子也斗他。开始他想不通，后来慢慢地理解，她这是为了保护她自己和孩子才和我划清界限。我听他这样分析，很受感动。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这样想，他夫妻俩真是知己知心。有一天李嘉人同志也要出去，他问我身上有没有钱，想买对鞋子。我身上只有5元钱全部给了他。过了10多天，他托人还给我。后来柯麟同志告诉我，他家里很久没有给捎钱了，原来她的妻子许稚人同志受不了迫供信，跳楼身亡了。我们同声摇头叹气。

青年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纷纷上山下乡。警司的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张草席，如有可交他们转交给孩子上山下乡用。我说有，我可以用塑料布，草席让给孩子。那时工资已全部冻结，家里每人只有10多元伙食费，没钱买席子才向我要的。我马上把席子捆起来，准备孩子来取也好见上一面。王金鼎同志陪我一起出到门口等。谁知工作人员不让我们父子见面，要由他们把席子交给孩子。连王金鼎同志也看不惯，回来的路上他陪我流着泪，大骂“不近人情”。我虽然没有骂出声来，但心里也真不是滋味！后来才知道席子是转给小杨的，他没有到梅花园来。

关押在这里的“走资派”慢慢减少了，从四个连并成一个连。谭天度和陈新两夫妇关在一起，谭在我这个班，陈新在林冰

那个班，上面规定他们俩不准讲话，一个住在宿舍的西头的男宿舍，一个住在东头的女宿舍。陈新很关心谭老的生活，知道他缺少内裤。我便说你买几条手帕拼成内裤，由我转交给谭老吧。后来我顺当地转交了。有一天谭被押出去了，陈新不知还能不能看到他，很想多看几眼。我告诉陈，到我的房间里来隔窗可望到，陈新就这样看着谭被带出去。有些同志被拉出去后，经不住批斗的苦，要求到警司来。王岚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揪出去批斗，没日没夜的车轮战，有时还挨打，真受不了，便自己要求回来，他说在这里至少可以睡个好觉。现在回头看，这种关押实质上是在混乱中对干部一种保护性的拘留，客观上保护了一批干部免致被打死。

在警司也得写材料，不断有外调人员来“提审”。有些外调人员都是带着框框来的，要按照他的主观意图写，很不实事求是。有一次上海工业学院的造反派要我写张敬人的材料。我讲他记。最后纪录要我签字。我一看许多东西不是我讲的，我不肯签，他们斗我，真不讲理！有一次我也被“押”到省委东一楼批斗，还有张华明等好几个人。斗完都搞成“喷气式”退场。有一个人伸出拳头喊口号，但拳头伸到我鼻子尖下就退回去了。我想这是做样子的，表示他是左派，实际上是明批暗保。又如有人说，我是赵紫阳的黑秀才、黑智囊，许多问题别人没讲清楚的，我却写清楚了。这实际是在表扬我。

当时警司有一件事做得很不好。本来中央已经下达命令不准搞游斗了。但在1968年的8月12日仍然把省级和部委级的“走资派”拉出去游斗。赵紫阳带头，省委副部长以上均陪斗，戴高帽子，挂黑牌子，背乌龟壳，有的手里还拿着个牌子。有凉鞋不准穿，要打赤脚走滚烫的柏油马路，这明显地要我们受罪。好在

老天爷帮忙，在游斗前下了一场大雨，马路就凉了，大家的脚没有被烫坏。这真是“邹衍下狱，六月飞霜”，老天都会怜恤好人。我们在省委礼堂被化装后，就出发，到东山，经中山一路、五路、北京路到市一宫。一路上除造反派外，警司也派人押着走，最后警司派人带着回到各自关押的地方。

（三）在花坪干校的日子里

1969年有一天，警司的工作人员通知我收拾好行李，要转移到韶关去。原来说通知了家属，他们会来送行。我被押送到火车站时，远远地看到了姐姐。姐姐说爸爸也来了，他走得慢，小青去等他了。但火车要开了，开车前两分钟，小青快步跑来了，总算和儿子见上了一面，但父亲没有见到。我对小青说：“我会照顾自己的，家里人放心吧！”小青深情地把一颗他们工厂特制的较大的毛主席像章送给我。在那个年代里，这是最好的礼物，也包含着要我“快点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意思。火车开动了，我们招手而别。心里真不是滋味，好在眼泪没有掉下来，火车向前进时，心情慢慢平静了下来。在室内关了很长时间，一旦坐着火车奔驰在广阔的熟悉的田野上，也算是一种享受了。

我是被转移到曲江花坪干校的。这里早已集中了一批省委党群战线的“五七战士”和一些待审查的同志，我被分配在三连。最初两天他们以为我是“五七战士”，很客气地和我打招呼。后来上面交待清楚了，我是寄押在三连接受群众监督审查的，情况就变了，冷淡了，也没有人跟我打招呼了。我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或写材料。我已有好几年单独被关在室内，突然能跑到空旷的田野里进行劳动，吸取新鲜空气，也是件高兴的事。但专案组

或其他提审人员来审问时，心里就有点恼火。问来问去还是那些问题：特支的问题，我在军校的问题。我讲的他们总是不相信，有时就来个逼供信。后来我就反过来问他们，我说我虽然一个人在军校，但我和特支是有联系的，如果我在军校出了问题，柳州十几位特支成员能安全吗？重庆的杜国庠、石凌鹤能安全吗？昆明的王洞若能安全吗？专案人员开始无话可答，后来他们蛮不讲理的说：“谁知你和特支谁先变的，或者一起变的？”特别是在1970年夏收夏种期间，一连提审89次，翻来覆去就是那些问题。我说，当时帮我送信去柳州给郑黎亚的是彭朗，他人还在，你们可以去向他调查。第89次讲完后，他们说明天再谈，没想到第二天照样前去时，他们却连铺盖都卷走了，再也没有见他们来了。这时在报纸上看到批“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的消息，我心里明白，批陈伯达了。我出去拾牛屎时，看到“五七”战士在学习，我想这是又一场政治斗争开始了，但详细情况不了解。

1971年秋，班里有人叫我把语录中的一张照片撕下来，他不讲撕谁，我把林彪撕了下来。从此以后对我的管制松了很多。但他们在讨论政治问题时，还是把我叫出去，不让我在隔壁房学习，怕我听到什么。有时外边下着雨，我就披了一件雨衣，戴一顶笠帽，拿着书到外边树下头去看。除了大田生产外，我还养鱼，夏天割草，秋天捡牛屎喂养。在秋风苦雨中看到山花在摇摆，触景生情，我就吟起诗来了：

李白桃红空自妍，花坪春暖草芊芊。

云山望断无鸿信，含泪思君又一年。

白芒林畔草惊秋，叶落寒泉涧咽流。

何事有家归不得？山花无语只摇头。

夏望秋兮冬望春，阴霾障日尽昏昏。

心潮叠起珠江浪，意绪浑茫瘦岭云。

水复山重应有路，花明柳暗岂无村？

千般话语凭谁说，唯见中天月一轮。

但这些诗只能在心里默念，或者在四面无人时，自吟自赏，以发泄一下心中的苦闷。后来《东湖诗草》出版，我把它们选了进去，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一些心情。

在这期间最苦恼的是想家的老老小小，尤其是想黎亚，音讯全无，生死不明。我经常背诵《长恨歌》，特别是背到：“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时，眼眶就湿润了。的确在分别这么多年里，连梦里也没有梦到过。也许她也被监禁，不让我们梦中相见。有一次收到家里来信，仔细一看，信封是旧信封反起来的，里面是黎亚的字迹，是她寄给家里的信封，我真高兴，好久没有看到她的字迹了。但没有地址，没有邮戳，她究竟在哪里仍不清楚。不论如何，总算看到她的字迹，知道她还活着。

1972年春，干校里的情况宽松了许多。有一天小斌、小青、小村、小杨四兄弟到干校来看我。孩子们都长高了。但由于我尚未获得解放，加在他们精神上的压力是很重的，虽然在我面前装着笑容，但我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苦闷。他们只告诉我家里3个老人好，但不知道他们妈妈的情况，究竟关在那里也不清楚，她的信是由专案人员交给家里的，每个月向家里要点粮票。四兄弟来后，我带他们到饭堂去买饭。那天正好加菜，每人饭碗上有七八块肥猪肉，孩子们心目中，我是从来不吃肥猪肉的，谁知我一

口气把它们全吃完了，他们就知道我饿得慌。他们说，要我放心，他们会改造好的，因为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不但这样讲还以行动来表现。他们推了好多车煤渣，为学校饭堂的斜坡上铺了一条煤渣路，做了件好事。第二天他们就回去了，看了这种情况，我心里很安慰，在这之前，小斌已先来过一次，那次我也很高兴。但当时干校的空气更紧张，我们父子间谈谈话还有专案人员在旁监视，实在没有意思，当然见面比不见面总好一些。

花坪干校是“斗、批、改干校”，实际上是整人的一个场所。有一批佛山的知识青年常常捱批斗。学校还有一个怪现象，今天斗人，明天又被别人拿着棍子监视自己。结果 600 多人的一个干校竟有 100 多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些被寄押在这里的原受审查的人成了“死老虎”，反而没人管我们了。我就抓紧时间做两件事，因为我懂得历史只能解决条件成熟的问题，条件不成熟，你想解决也解决不了，着急也没有用。第一，我抓紧时间劳动，学点技术并锻炼身体。有一年半时间我在养鱼，就向一位有经验的技术员——毛泽深同志学技术，我们一共管理八九亩塘。夏天去割草，冬天捡牛屎，鱼长的很快，春天放鱼苗，到国庆时可长到四五斤重。每逢国庆或春节加菜时，我们把这些鱼捞上来，看到大家能吃上这些新鲜鱼肉时，我心里感到很高兴，我的劳动是有效的，能为大家服务。第二，我抓紧时间看书。在干校之前，我已读了毛选一、二、三、四卷《鲁迅全集》10 卷，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材料，《列宁文选》4 卷。后来家里可以送书来了。我读完了《资本论》一、二、三卷，还看完了毛主席倡导看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大字本 18 本。有些书买了一二十年放在书架上没时

间看，现在有大把时间来阅读。边读边思考一些问题，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书读是很幸福的。许多人在开会、表态、说些空话，我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会议，埋头读书倒比参加这些会议还有益。看来有点阿 Q 精神，但确有帮助。特别是冬季，粤北天气比较冷，我们在宿舍里自己修了个煤炉，四五个人一个房间，一边烤火，一边读书，真美！有时积了些零用钱，虽然不准趁圩却可托人买一包红茶，一罐奶粉，一包白糖，几个鸡蛋，在煤炉上煮一煮，喝上一杯，简直成了活神仙了。这真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我在这种境遇中，这是前进的、向上的。这样一来，虽然形势严峻，倒还可以应付，身心还算健康。

(四) 回广州治病

1972 年冬，在干校医务所发现我的眼睛有病，玻璃体混浊很严重，视力模糊，我就趁学员春节回广州休假的机会，向连部请假回广州治病。他们批准了，我很高兴，可以回家了。3 年前被监护着坐火车到韶关转花坪，现在虽然尚未解放，但我可以自在地坐着火车回广州了，心情宽松了许多。我自己用一根扁担挑着 60 多斤的行李，戴着一顶草帽，从东站往东山合群二马路的家里走去。自己满得意的，“知识分子劳动化了”。想到母亲一辈子靠一根扁担挑东西养活全家人，现在我真正体会到这根扁担的作用和份量了。那时街上很少车辆，我有意识走在马路上，想见到一些熟人，但谁也没有见到。一路上冷冷清清，知识青年也都上山下乡去了。马路旁边的树木都长高了。我离开家将近 7 年了，这次回家事先没有通知家人，我生怕突然回去，他们会兴奋过度受不了。我心里作好准备，一定要装得轻松，不激动，高高兴兴地见面。当我轻轻地敲门时，阿松（我外甥女的小儿子）

来开门。我有意识地问他，你看我是谁？孩子望了我好半天认出来了，“舅公，舅公回来了！”我也就大声地大喊：“爸爸、妈妈、阿姊，我回来了。”我表现得很轻松愉快。在这种气氛下，老人们也高兴，没有过份激动。刚坐下，他们告诉我，黎亚也回来过。她现在从化五七干校，原来关在韶关三焦，前几个月转过来的，何明、高梅昭等先解放，跑来告诉家里，妈妈和小青到从化干校去看过她。在那里住了一晚。以后小斌、小村、小杨、小英（我的外甥女）、姐姐也分别去看望她。我最关心的事，他们主动讲了。原来我关在花坪时，她在三焦，只隔一条武江，真像牛郎织女似的。牛郎织女每年7月7日还可以相会一次，我们7年了连面也没见过！后来大家说，赶紧打个电话到从化干校，告诉她，我回来了，要她请假回来。小青为了要把他妈妈的消息告诉我，昨天去了花坪干校，谁知他扑了个空，又赶回来了。4个孩子只有小青在家，他在铁合金工厂工作，小斌在连县农机厂，小村在海南岛建设兵团，小杨在阳山江英公社插队。他们都是请了假回来看我们的。

黎亚接到家里电话后，几经周折，总算请到假从干校回家了。一见面久久讲不出话来。她本来是很健康的，这7年把她折磨得不象样了，头发全白了，牙齿掉了，背也有点驼了。她劳动强度大，粮食不够吃，又害了钩虫病3个“+”，思想压力大，进103队时120斤，现只剩下80斤，我见了后，心里一阵一阵难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虽然很艰苦，但这是对敌斗争，我们满怀豪情地战胜一切困难共同走过来了。想不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关那么特殊，那么难熬。不论如何，全家能活着见面就是不简单了！妈妈说，他们天天盼、月月盼，就盼到这一天。开始时，以为“大联合”可以回家了，以后说“革委会”成